



一册校勘本里的出版往事

胡春晖

我手头有一本《拿破仑情书集》，由梅沱、凯希、凯常翻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9月一版一印。这是译者梅沱的校勘本，书的尾页钤有“梅沱”印章，还写有多排校勘文字。梅沱本名徐梅芬，是武汉大学新闻系教授、翻译家，同时也是掌故家徐凌霄、徐一士的堂侄女，著名梅派艺术研究家、戏曲评论家许姬传的表妹。

本书共收拿破仑书信580封。译者对每一封信，特别是内容不完整的残信，都认真对待，多方查找拿破仑所处时代的史实、拿破仑本人的事迹，考订信件撰写的时间与地点，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。部分信后还附有注释，译者注重“言必有据，符合历史真实”。

此书由戴文葆担任责任编辑。戴文葆在序言中写道：译者通过弥尔顿《失乐园》汉译本的译者，写信给本书店编辑部，提出译介拿破仑的情书。本书店总经理欣然同意，我被指定担任这一选题的责任编辑。

随书一起淘得的，还有戴文葆为此书出版写给徐梅芬的几封信：“您的

译稿已妥收，并请三联书店考虑。日前三联总经理沈昌文同志告诉我，欢迎此稿，已提了选题。请您把后面校好挂号寄下。列入文化译丛。至于曹辛之同志，他是三联老前辈。但这一套书已有过好几本，封面固定，就不烦劳他了，务请见谅！”“糨糊多用一瓶，剪刀常挥，手指头被订书针弄出血，忠实的仆人夜里工作到十二点，早晨六时又伏案，一切为了早发稿”“今天上午送走客人，下午读大稿，见缝插针，祈祷上苍，能一直插入，好不好？早点完工。”落款署名“Y.J.”，署名左边还写着“你以为Y.J.是什么？”戴文葆笔名之一为“郁进”，署名应该是此笔名每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。信的上款有梅芬兄、梅芬同志、阁下几种称呼。

书里夹着一页从杂志上裁剪下来的内页，是韩剑所写的《拿破仑“凯旋”》。文章末尾有徐梅芬的手写字迹：“八小时之外，1992年3月”，表明这篇文章出自1992年3月的《八小时之外》杂志。此外，还有一封徐梅芬写给武汉市人口办公室负责同志的退信，信中她恳请对方帮忙查找侄子余

方的下落。这封信因投寄地址不详被退回，徐梅芬的这个希望很可能是落空了。

书中校勘的地方，都用笔标注着，如“效区”改为“郊区”、“福利”改为“福祉”、“四个儿子”改为“三子一女”、“王苡珠”改为“王以铸”。此外还细化了历史人物的生卒时间，在原有年份基础上补充了月、日信息。如“布吕歇尔(1742—1819)”改为“布吕歇尔(1742、12、16—1819、9、12)”、“亚历山大·瓦莱夫斯基(1810—1868)”改为“亚历山大·瓦莱夫斯基(1810、5、4—1868、9、29)”

作为资深编辑家、首届“韬奋出版奖”得主，戴文葆说过：编辑的工作，固然绝不像别人所说，是什么“简单的重复劳动”，在学术领域中也不是掌握稿件生杀予夺的权威，得以强行要求著译者与自己绝对保持一致。编辑处理稿件，需要懂得对著译者作必要的妥协，避免强加于人，保持应有尊重。他同时还说：通过编译出版此书，谨向翻译界先生们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可否设法鼓励多种方式、多种层次的译介，为读者更好地引进国外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。

这些话，对于当下的编辑出版从业者和译者而言，也应有很强的学习借鉴意义吧。

网开一面

叔本华说：我们常常会搞错快乐的来源。在这个被多巴胺绑架的时代，有些人疯狂追逐着感官的愉悦，将快乐等同于片刻的满足，可当喧嚣散去，只剩下更深的空洞与迷茫。直到这时或才惊觉，最极致的快乐，或许藏在那些自以为的“不快乐”之中。

我们总在汲汲营营地寻找快乐。刷网络短视频时，短暂的笑点让人咧嘴大笑；网上购物支付的瞬间，拥有的快感或许直冲头顶；朋友圈的点赞中，时时感觉自己被快乐填满。可这些快乐就如同沙滩上的城堡，潮水一来一去后便轰然倒塌。当手机屏幕暗下，当看着地上堆积的快递包装盒，巨大的失落感又渐渐袭来。我们开始疑惑，为什么拼尽全力抓住的快乐，如此易碎。

其实细想一想，那些被视作洪水猛兽的“不快乐”，或许才是快乐的容器。独自在图书馆啃下一本晦涩的哲学书籍，过程枯燥又煎熬，可当合上书本的那一刻，思维被拓宽的通透感，是那么值得久久回味。工作中，为了一个项目连续奋战，反复推翻方案的焦虑频频让人几近崩溃，可当最终成果落地，那种自我实现的获得感，足以抵消所有付出。甚至是某个深夜里突如其来的忧郁，在我们直面内心的脆弱、与自己达成和解之后，反而能收获内心的平静。

最快乐就是不快乐。因为在那些看似痛苦的现实经历里，我们挣脱了欲望的枷锁。我们不再把快乐寄托于瞬息万变的外物、互联，而是在与困难的真实对抗中，亲手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这时候的快乐，不是稍纵即逝的烟火，而是长明的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当我们不再借助互联网去逃避那些“不快乐”，学会在真实世界中沉淀、思考、成长，或许会发现，那些曾让人皱眉的时刻，最终都变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礼物。所谓最快乐，不是刻意营造的假象，而是在接纳不快乐之后，收获的那份从容与坚定。

最快乐与不快乐

张希

女儿的800米跑在班里总是遥遥领先，老师的认可、同学的夸赞，更让她备受鼓舞，渐渐爱上奔跑，也在一次次冲刺里，收获了满满的自信与成就感。平日上体育课，她一直穿着普通运动鞋。一天，女儿轻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要一双专业跑鞋。”

我感觉有些愧疚，自己从未在意过，喜欢跑步的女儿对于鞋子的需求。但这份愧疚，很快就被繁杂的工作与琐碎日常冲淡。我并未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可女儿却一直惦记。

前几天，她爸爸送她上兴趣班，课后女儿打来电话，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妈妈，可以让爸爸给我买一双跑鞋吗？”一瞬间，愧疚再次涌上心头，我立刻温柔应声：“当然可以，爸爸挑选的

一定很合适。”

晚上，女儿兴奋地向我展示她的新鞋：“妈妈你看，好看吗？穿上脚，特别轻盈有弹性。”“真漂亮，颜色好亮眼。”“跑鞋都是这样鲜艳好看的，我没有挑最贵的牌子，这个性价比就就很

闺女的跑鞋

王丽君

好。”看着乖巧懂事的她，我一时无言。

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女儿要去夜市散心，满心期待地换上崭新跑鞋：“妈妈，我还从没穿着它出门呢。”夜市灯火热闹，女儿时不时摆出起跑姿势，雀跃地跟我分享：“这双鞋特别轻便，抓地力

很好，足弓有支撑，回弹特别舒服……”

女儿的话语，不禁把我拉回到自己的童年。小学一二年级时，我一直穿着耐穿的男款球鞋，看着别的女孩脚穿白舞鞋、搭配漂亮裙摆，满心羡慕。三年级，我向母亲开口央求，想要一双白色舞蹈鞋。后来母亲赶集归来，带回一双鞋边微微泛黄的特价舞鞋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依旧欢喜万分。穿上新鞋，感觉步履轻盈如风，三里路程十五分钟便走完，一路蹦蹦跳跳，仿佛身生羽翼，飘飘欲飞。

“妈妈，你快看我走得有多快！”女儿清脆的叫声唤醒我的思绪，眼前奔跑的小小身影，分明就是当年的自己。

时光流转，爱意代代相传，对一双鞋的期盼，藏着两代温柔的童年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，凡手写稿件，恕不能退稿，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，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，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：jwbfbk@163.com

近期在短视频平台持续刷屏的“斯皮尔伯格镜头”，并非字面意义上由导演斯皮尔伯格亲自掌镜的影像，而是一套被网友解构后应用于日常创作的标志性镜头叙事模板。它的核心在于通过移动摄影和精密场面调度，在环境铺垫后让关键人物或物体“突然”闯入画面，制造强烈的戏剧性突现效果与叙事张力。通常镜头先以缓慢推进或平移的方式对准某一环境或次要人

物，就在观众以为自己已然锁定时，主角从画面边缘或遮蔽物后出现，瞬间抓住观众注意力。这一技法因能精准营造“主角感”与“戏剧感”被广泛效仿。本质上，“斯皮尔伯格镜头”的走红，折射出短视频时代“电影质感”的下沉：普通人不再满足于平白直叙的拍摄，而是渴望用顶级导演的视听语言，为日常琐碎赋予别样光彩。

网络新词语

斯皮尔伯格镜头

丁士舜

孙三长有两只奇特的耳朵。

小时候，孙三五官端正，两耳与常人无异。他依稀记得，自懂事起，两耳便悄然间起了变化：左耳听好话，右耳听坏话。

听好话的左耳，日渐丰盈，状如蒲扇，竟遮住了半边脸庞。每当他转身、回头或走路时，左耳不时“啪啪”拍打左脸，引得路人侧目指点，围观讪笑。听坏话的右耳，却如遭风吹霜打的花朵，一天天萎缩，耳孔逐渐收窄，耳郭慢慢消失，最后仅余一弯月牙形微隆肉条，以及牙签大小的窟窿眼儿。

随着两耳形状不断改变，听力水平也出现了天壤之别。左耳听力敏锐如猎狗，即便在闹市相隔十余米，别人咬耳朵说的好话，亦能听得明明白白。右耳却截然相反，听力急剧衰

退，连下雨打雷的声音都弱得像蚊子嗡嗡叫。

两耳的变化不仅严重损害了孙三的容颜，还让他与人交流困难重重，生活质量大打折扣。犹豫再三，他鼓起勇气走进当地一家医院，求助知名外科专家“郭一刀”。

郭专家乍见孙三的耳朵，惊愕得连揉数次眼睛，几乎不敢相信眼前所见。经过一番全面检查，郭专家神色凝重地对孙三说：“若放任不管，左耳或将疯长至腰身、腿脚，右耳则可能完全消失不见——我可以帮你手术恢复双耳正常大小，但无法治愈你选择性心理耳病……”

“选择性心理耳病！我这是耳病还是心病？”听了郭专家一番话，孙三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……

